

民族史译文集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編译

科学出版社

K18-53
(W) 1

0079879

民族史譯文集

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O-0079879

科 學 出 版 社

1959

100660



民族史譯文集

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譯

科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61 號

科 學 出 版 社 上 海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

1959年2月第 一 版 書號：1623 字數：36,000

1959年2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27

(總)0001—1,910 印張：6 4/27

定價：(9) 0.70 元

目 錄

編者的話.....	(封二)
中國編年史中的古代民族(匈奴、東胡、鮮卑、室韋)	
與鄂溫克人.....	E. 札爾金特(1)
通古斯族源問題的研究.....	M. 列文(14)
關於契丹與通古斯人的問題.....	Г. 華西列維奇(44)
契丹及其族屬.....	E. 札爾金特(55)
早期封建國家拓跋魏.....	Л. 杜 曼(70)
北亞民族起源短論.....	A. 伯恩施坦(81)
南阿爾泰人族源概述.....	Л. 波塔波夫(87)
中亞古代游牧民族史的爭論問題.....	A. 伯恩施坦(110)
關於中亞民族起源的古人類學材料.....	B. 金茲布爾格(115)
論柯爾克孜民族起源問題.....	A. 伯恩施坦(120)
關於柯爾克孜族名的話義分析.....	C. 阿布蘭遜(135)
蘇聯柯爾克孜共和國的東干人.....	Г. 斯特拉塔諾維奇(149)
關於土庫曼族起源問題的若干資料.....	A. 伯恩施坦(154)
十九世紀土庫曼族的奴隸制問題.....	A. 莫羅佐娃(159)

編 著 的 話

“民族史譯文集”共收集了蘇聯雜誌上發表的有關民族歷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十四篇，文中談到的民族，有些是和我國東北、西北、新疆地區的少數民族有關，有些是和我國北方古代民族有關，這些文章對於研究我國某些少數民族的起源和發展，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這些譯文，有七篇過去曾在“民族問題譯叢”上發表過，另有七篇是最近新譯的。



中國編年史中的古代民族

(匈奴、東胡、鮮卑、室韋)與鄂溫克人

E·札爾金特

東亞古代史中許多民族，已無影無踪地在歷史舞台上消失了。它們的族屬問題直到今天仍為東方學熱烈討論的對象。根據我們已知的民族的資料來確定這些民族的關係無疑地是屬於最困難的問題。歷史報導的可靠性小，語言學資料的自相矛盾和意見分歧，東亞各國現在居民(特別是人數不多的土著部落)的調查少，使這個問題的解決發生了很大困難。

研究有關東亞古代史問題的重大困難也是由於下列情況造成的，即在歷史文獻中所提到的民族經常改變自己的名稱。以某一名稱而見稱的民族，百年之後又以其他名稱出現，再後又以第三種名稱出現，要探索其間的起源聯繫，往往變成非常困難的事情。這是因為中國的編年史所記載的不是族名，而是國名，國名一般也是取之於佔主導地位的部落或氏族的名稱。

佔統治地位的部落被擊潰後，另一個部落便出現於歷史舞台，整個民族政治綜合體也就得改變自己的名稱，而戰敗民族的名稱便消失了。例如北方匈奴於公元一世紀為鮮卑族所擊潰之後，我們在中國的編年史裏便不再看見匈奴這一名稱了。

同時，也有這種情況，即同一個部落聯盟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名稱。

當科學界還沒有找到解釋無數的名稱變異的鑰匙時，對和中國毗連的各國遠古史進行考察仍然是一種冒險的事情，無論如何，古歷史學的探索的前途決不是很有希望的。

雖然這樣，但是許多科學家都企圖把現代民族——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滿人——和中國編年史中所提到的各族聯繫起來，這些民族就是在興起那末快而解體又那末快的雄強的政治組織中佔

統治地位的、並在東亞史上留下遺跡的民族。

本文是對那些把古代民族（匈奴、東胡、鮮卑、室韋）和鄂溫克人（在文獻上更常見的名稱是通古斯人）聯繫起來的作者們的民族起源論試作一批判的研究。

類似的評論，按照我們的意見，就是在研究通古斯-滿族的起源時也會有用的。

匈奴的族源問題是個異常複雜的問題，他們在公元前二世紀勃興，當時他們的權力使得居住於中亞廣大區域的各個民族都臣服自己，由於他們的侵襲，漢人大吃了苦頭，因而在自己的編年史裏過分地誇大了匈奴的强大和威力。

關於匈奴的族屬問題的研究，如果從法國學者迭京涅^①的著作問世算起，已有 200 年左右的時光了。東方學者雖然對這個問題予以極大注意，但迄未獲得充分令人信服的結果，還不能從這結果中在許多有關匈奴起源的假設中取出認為比較滿意的說法，或者認為匈奴就是在歐洲史上留下破壞痕跡的匈人（гунны）的問題是已經解決了。伊諾斯特蘭采夫^②著作中所搜集的這些假設確證了從事研究這一疑難的民族起源問題及其歷史問題的學者間的意見是有很大分歧的。有一部分的學者認為匈奴即是匈人（гунны）是很真實的，可是相反的，另一部分的學者却堅決反對這樣的比擬，認為它的根據是不充分的。

關於匈奴的族屬問題，意見更分歧了。有的人把他們和蒙古人聯繫起來，有的人把他們和突厥聯繫起來。有些作者則傾向於把他們列入“芬蘭種族”中。

我們暫且把上述的一切理論擱在一旁，只是談談一些學者認為匈奴和通古斯族，更確切地說，和通古斯-滿族有某些關係的意見^③。

① 迭京涅：匈奴史。

② 伊諾斯特蘭采夫：匈奴與匈人，1926 年。

③ 不應忘記，東方學家心目中的“通古斯種族”一名不僅是指鄂溫克人（通古斯人本身），而且也指滿人和朝鮮人，有時也指日本人。

有些作者提出了在匈奴這一民族複合體中存在着通古斯-滿人成分的各個假定意見。例如帕拉斯便認為匈奴人“或者是蒙加爾人，或者是布里亞特人，但也可能是通古斯人”。[⊖] 阿別爾·列繆查指出了通古斯族地名廣布到裏海[⊖]，而這只能從通古斯-滿人成分滲入到參加西方大遷徙的各族中去解釋的。

但是這個意見是不足為據的，它的意義不應作過高的評價，匈奴起源於通古斯人的理論在西歐科學界沒有得到傳播。

在匈奴史的許多解說者中佔有特殊地位的是日本著名東方學家白鳥庫吉，他承認“通古斯族”在匈奴的民族複合體中佔有並不次要的位置。

白鳥庫吉的對於匈奴民族起源的看法最早在 1900 年就介紹給歐洲的讀者了，那時候他用德文寫的小冊子“匈奴及東胡諸族言語考”[⊖] 在東京出版了。白鳥庫吉承認語言是確定各族民族成分的主要標誌，從而分析了在古代漢籍保存下來的匈奴語的許多文字，並作出匈奴是屬於突厥語系的結論，這一結論是和晚近極盛行的匈奴突厥論（匈奴即突厥）的學說相一致的。

23 年後，白鳥庫吉刊行了論匈奴語言的第二篇論文，在這篇論文裏他宣佈自己的舊觀點是錯誤的。在提到他過去是屬於匈奴是突厥說法的擁護者之後，白鳥庫吉寫道：“以後，我繼續從事於這一題目的研究，我認識了這一意見是錯誤的，我現在確信這一民族不是別的民族，而正是以蒙古成分佔優勢的、蒙古人和通古斯的混合種”[⊖]。

對於匈奴語殘餘的多年的研究，白鳥庫吉得出了這樣的結果，說這種語言和突厥語言相近是絕少根據的[⊖]。他指出在顯然屬於匈奴語言的 23 個字當中，有 4 個字大概源於突厥語、蒙古語和通

[⊖] Наллас. Разделение народов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1797 г. СИЕ, стр. 63.

[⊖] 阿別爾·列繆查，“突厥語研究”，第 148 頁。

[⊖] D-rK. Shiratori: Über die Sprache des Hiung-nu Stammes und der Tung-Hu Stämme, Tokio, 1900.

[⊖] 白鳥庫吉：“論匈奴的起源”，第 21 頁。

[⊖] 同上，第 79 頁。

古斯語，有 2 個字大概源於蒙古語和通古斯語，有 14 個字大概源於蒙古語，只有 1 個字是源於突厥語的。

這位日本學者是當作新發現來強調匈奴語和通古斯語的關係的。而在論文裏只援引了三個可以確證作者的看法的字：① tch'eng-li (天)與突厥語和蒙古語 tängri 相近；② koutou'u (兒子)與通古斯語 guto 相當；③ ači (統治者)與通古斯語 asi (婦女)近似[⊖]。

關於白鳥庫吉的語言資料的優點是很難作出判斷的。在最早的中國朝代史中保存下來的和漢字所表現的（在中國人聽來陌生的字音完全是曲解的發音）匈奴語言的單詞的讀法本身，直到今天依然是個爭論的對象。每一個研究者都是從自己的、有時是偏執的見解去處理漢字發音方法的，按照自己的意見去恢復早已死亡的語言的單詞。

白鳥庫吉的假說是僅僅根據匈奴語言的一些恢復過來的極成問題的單詞建立的，所以他的假說在我們看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白鳥所發現的語言學資料不僅是貧乏的，而且是可疑的，把匈奴和某個民族等量齊觀的做法和類似這樣的嘗試來必為人所接納。

把匈奴和現代的民族組成聯繫起來的一切理論，其中每一理論從語言學觀點看來都有贊成和反對的方面，都是太沒有根據的理論。中國人所稱的匈奴顯然是把許多游牧部落列入其中，他們暫時聯合為一個統一的政治組織，按東方一般習慣，冠以佔統治地位的部落的名稱。關於後者（統治部落）的民族識別問題，在中亞細亞古代史知識的現時的水平下是不易解決的，因為有關這一政治組織中佔統治地位的部落的考古學和語言學資料一般說來是很少的，所以沒有充分的根據。

[⊖] 如果白鳥的標音是正確的，最後一個字是極有興趣的。大家知道，表示血緣關係的專門用語有許多在諸民族間是相同的。鄂溫克語 asi “婦女”可能和匈奴語 ači “統治者”（參考古突厥語 ači “哥哥”“伯叔”）有一定的關係，同樣，通古斯語 ečen “別人”也可和契丹語 čen “父親”作比較。可否從專門用語的一致中間看出母系氏族的古代關係？當時有從婦居制的婚姻，丈夫是從“別的氏族”來的陌生人、外來人。

因此應該承認把匈奴史解釋為政治史和把匈奴國家的民族成分問題作為懸案的看法即迭京涅的看法是最客觀的。對於我們的題目來說，可以充分確認根據非常不關重要的、偶然的和不甚可靠的辭彙比較把匈奴和鄂溫克人混為一談決不能認為是有理由的。

關於匈奴以東的國家的居民（中國史料列入“東胡種”中）問題也是使舊漢學家頭痛的一件事。這一名稱，由於它的發音和“通古斯”一名相近，便使得許多史料在有關“東胡種”的民族識別問題發生錯誤了。有許多研究人員只滿足於名稱的發音相近便直接把東胡和通古斯人等同起來。這種錯誤幾乎在 19 世紀一切的東方學者間都見到，連最近的一些研究人員也是不免的。例如甚至像伊諾斯特蘭采夫那樣謹慎的作者尋常也引證“值得注意的研究”，大膽地把中國編年史裏的古老“種族”——東胡和通古斯人之間劃一等號[⊖]。

但是中國編年史本身對這種純形式的比較沒有提供任何根據，在一本古編年史寫道：“……學者服虔說：‘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 胡是漢人用以稱呼和他們比鄰而居的諸民族的名稱，一般翻成異族，東胡單指“東方各異族”之意。因而用外表的語言學的方法來證明名稱的一致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應該預先說明，這裏所談的僅是“種族”[⊖] 的名稱。至於東胡的族別問題，那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就很不一致了。

約金夫認為東胡是蒙古人，在他的“資料彙編”第一編的導論中我們可以讀到：“當 3 世紀初，匈奴嚴重地威脅到中國的時候，漢人已判明蒙古人就是不久以前的從屬於兩個同種的匈奴和東胡皇室最高權力之下……東胡按亞洲的史料看來就是統治東蒙古的韃

[⊖] 伊諾斯特特蘭采夫：“匈奴與匈奴”，第 93 頁。

[⊖] 白鳥庫吉：“論匈奴的起源”，第 80 頁。

[⊖] 這裏應該着重指出，“種族”這一術語在社會學方面的應用是完全錯誤的，由於好戰的種族主義在若干國家中佔統治地位，在近年來具有了特別可憎的性質。“種族”概念是從生物學的特徵的總和形成的，任何的歷史構成是不能用種族的特性來說明的。

韃汗皇室[⊖]。華西里葉夫院士以爲東胡就是通古斯-滿民族，認爲不妨順便說說：“古代東胡不僅僅是一個滿族”。他也把契丹（蒙古人）列入東胡之中[⊖]。

日本學者——已經提到的白鳥庫吉和鳥居龍藏的探索應該被承認爲對於東胡的最杰出的研究；這些探索使得他們倆達到了一致的結論，即古代東胡和通古斯人之間存在着差異，白鳥根據語言資料的比較分析，鳥居由於考古學遺物的研究達到了上述的相同結論。

白鳥確定了古代東胡和現在蒙古的語言是近似的之後，便承認他們是“兄弟們”，推翻了西伯利亞通古斯人以及滿人源於東胡的說法[⊖]。

鳥居[⊖]也是反對東胡與通古斯人相同的意見的。而這些民族如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女真等都不是東胡，而是通古斯人；[⊖]“他們的語言、他們的風俗習慣、他們的傳說、考古學和民族學資料，一言以蔽之，一切都證明這一點”[⊖]。（着重號是我加的——扎爾金特）。

鳥居完全令人信服地論證了上述的論點後，但是得出了關於通古斯人和東胡在較古的過去具有共同祖先的這一意外的結論。鳥居斷言：但是通古斯和東胡無疑地是有共同祖先的和彼此間發生了從兄弟的關係[⊖]。鳥居由於通古斯人（包括滿人和朝鮮人在內）離他們原先居住的中心（假定的）很遠，遂視爲最早的移民者。

著名的外國反動的通古斯學家史祿國注意到了鳥居關於東胡和通古斯共同起源的結論的矛盾，他也引用了有關這兩個民族的

[⊖] 修道士約金夫（比邱林）：“古代中亞各族資料彙編”，聖彼得堡 1859 年第一編導論第一章。

[⊖] 華西里葉夫：10 世紀至 13 世紀中亞東部歷史和古代、專刊第五編，聖彼得堡 1853 年版，第 6 頁。

[⊖] 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

[⊖] 鳥居龍藏和鳥居君子：“東蒙古的原始居民”，第 19 頁。

[⊖] 鳥居把“通古斯人”一詞理解爲通古斯人和滿人。

[⊖] 鳥居龍藏：“滿洲的史前居民”。

[⊖] 同上。

完全差異的，無論是民族學上和人類學上的差異的最令人信服的證據。按史祿國的意見，鳥居的荒誕的結論說明他是醉心於“曾經摩登一時的假設，這個假設認為操所謂烏拉爾-阿爾泰語的、在他看來日本語也包括在其中的所有民族都是有共通起源的”[⊖]。問題的本質正是由於最近的情況，而決不在於鳥居對烏拉爾-阿爾泰假設有特別好感。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自己的侵略政策正在找尋理論上的根據。一般是吹噓日本人和那些應變成日本擴張政策的犧牲品的民族在血緣上是接近的和歷史上是有密切關係的，並使科學忙於證明聯合到所謂烏拉爾-阿爾泰語系的許多民族都是日本人的“兄弟們”。

大家都很清楚日本民族主義科學最反動代表之一的鳥居教授由於全面研究滿洲古代史的結果一邊得到滿洲古代居民——東胡和通古斯-滿人的起源是不同的這一在自己看來極不愉快的結論，一邊偽造史料，力圖說明東胡和通古斯人按其最早時期好像是起源相同的，所以是“兄弟們”，如果不是骨肉兄弟就是“從兄弟”。

關於“東胡種”的族屬問題只有當進一步的科學研究能够恢復（雖然不是充分地）滿洲遠古的歷史的時候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目前這還是未來的任務，因為鳥居的考古學研究像已經指出的，由於服從於一定的政治主張，所以是反科學的和更難信以爲真了。同時也可以期待遠東古代語言的深入研究會有新的發現，但是同時也不應漠視我們手上的、被認爲是“東胡部落”的語言的個別單語，比起匈奴語言的詞彙文獻來，其價值是更成問題的[⊖]。

雖然我們還遠未能完全解決提出的問題，但是現有的史料依然可以得出某些結論的。約金夫關於東胡是蒙古族的意見完全說明了著名的俄國漢學家對於東亞古代各族分佈情況的獨創的看法。從各族自古以來居住於同一地區的看法出發，約金夫把中國編年史中所提到的居住於現今蒙古人所佔據的地方的“各部”無條

⊖ 史祿國：“北通古斯的社會組織”1929年上海版，第146頁。

⊖ 參看白鳥庫吉：“匈奴及東胡諸族言語考”。

件地列入這種民族之中[⊖]。白鳥的類似的意見就是以不充分的、有爭論的詞彙比較爲根據的。

盡管從約金夫翻譯的中國編年史譯文和白鳥的論文中得出最後結論的根據是不充分的，但是他們兩位作者所提供的資料和從鳥居的著作中所能找到的有根據的實證材料總起來看仍可看出以下各點。

東胡一名包括有按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根據鳥居的資料所作的判斷）位於接近匈奴的水平那樣水平的各個分散的游牧部落在內。

這樣，要嚴格區分東胡和匈奴未必是有根據的。各個部落在經常的衝突和分散情況下很容易從“匈奴”的成員中轉入到“東胡”的集團中去。衝突和分散都同樣地爲各不相同的部落聯盟形成的根本原因，後來各族的民族整體就是從這樣的部落聯盟產生的。無論是“突厥”（тюрк）[⊖]一名也好或蒙古一名也好在長期的時間內僅具政治的意義。

應該特別指出，關於東方的匈奴和東胡等同看待的意見在中國歷史文獻中[⊖]也不是陌生的。

把中國歷史學家看作是東胡後裔的鮮卑與通古斯人等同起來的意見，也在東方學中有其擁護者[⊖]。認爲鮮卑和鄂溫克人同族的索斯諾夫斯基的論文，按時間來說是這一領域中最後的一篇。他的論文[⊖]是針對伯希和教授口稱鮮卑語是屬有土耳其語而作的一種批判，這位法國傑出的法國科學家爲了這個令人信服地介紹

[⊖] 伯恩施坦：“突厥人的起源”，載“前資本主義社會史問題”，1935年，第5、6期，第47頁。

[⊖] Li-Ung-Bing: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Shanghai, 1914, p. 268。同時參看白鳥說的：“東胡族不是別的民族，正是匈奴種族的一支”“論匈奴的起源”，第81頁。)

[⊖] 例如參看 Z. Deny, langues turques, langues mongoles et langues tonngouzes, les langues du monde, p., 1924, p. 219 et 235.

[⊖] 約金夫：“蒙古札記”，卷一，1828年聖彼得堡版。

[⊖] 索斯諾夫斯基：“鮮卑-鄂溫克人”，載“西伯利亞活的古代”，第8期和第9期，1929年，伊爾庫茨克版。

了他在漢文史料中所發現的鮮卑語的語彙[⊖]。

對於伯希和教授想根據語言資料來確定一個族的民族成分的意圖表示反對之後，索斯諾夫斯基寫道：“但是能否認為伯希和根據看來像鮮卑語的詞彙那樣重要的資料而下的判決是最後的判決呢？不能，依然還有許多疑問的。認為語言（整個說來）是任何族系最不穩定的特徵的斷言，早就變成庸俗的了。”但是除了語言之外還有像物質文化、精神文化、人類學特點等等的同樣重要的特徵。”[⊖] 在這樣的斷然的開場白之後。不錯，隨即指出了考古學資料的缺少和漢文史料所提供的資料的貧乏和曖昧，作者全神貫注於這些重要的特徵，如果對此沒有全面的研究，就應該同意，徹底解決一個民族的族屬問題是不可能的。但是，與這些期待相反，索斯諾夫斯基把自己局限於更窄的範圍，企圖依靠族名的比較研究去證明兩個文化面貌完全不同的民族是同一的民族。研究本身無疑的是有用場的，但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即它的結論和衆所周知的歷史事實不抵觸，而研究要是合理的。

按照索斯諾夫斯基的意見，現在的鄂溫克人是過去構成偉大國家（指公元 158 年到 178 年檀石槐所建立的國家）的統治階層的强大民族——鮮卑的遺裔。在這個大國裏面除了通古斯人之外還包括蒙古部落和突厥部落在內。

索斯諾夫斯基企圖通過克特人（葉尼塞奧斯加克人）對通古斯人的稱呼：féamba, hangba, häangba（根據卡斯特林的意見，最後這種形式是原來的形式）去把鮮卑和鄂溫克的族名併合起來。根據像克特的 ēa (кетское ēa) 轉化為科特的 ō (котское ō) 等等的母音交換的這樣的共同特點，索斯諾夫斯基遂確定了這個族名的演變：heangba→*heenba<hewenba。後一專門名稱的摩擦音的變體就是漢文“鮮卑”的基礎：*sewenbe>seenbe || sien-pi[⊖]。

[⊖] 可惜伯希和教授直到今天還沒有把有關鮮卑語的材料公佈出來，他的意見是很有興趣的，因為過去他是把鮮卑人列入蒙古人之中的。

[⊖] 索斯諾夫斯基，上著，第 187 頁。

[⊖] 同上，第 188 頁。

索斯諾夫斯基當作多數殘餘形式的接尾部 ba 在造詞法中被接尾部 ki 代替了，按照他的意見這個 ki 就是表示“人們”、“部落”、“男人”[⊖] 的概念的“gir”部落(可能是氏族的？——札爾金特)一名的接尾部的簡式。

索斯諾夫斯基的語言學的比較是以下面的出人意料的結論來結束的：“我們意識到克特人所理解的“通古斯人”是和“鮮卑”同族的。仔細的語言學分析(?)證明“鮮卑人”的名稱即“хевелба”是克特人首先從當作自稱的通古斯人的口中聽來的，這一自稱直到今天還存在於通古斯人中間，不錯，形式有些改變而已：鄂溫克人(эвенки)[⊖]。

很難用“克特人首先從通古斯人自己的口中聽來”的“鮮卑”名稱這一絕對的(無證據的)斷言來和有根有據的反對意見相對抗。但是必須指出在西伯利亞土著中間，特別是通古斯-滿人中間沒有記下自稱與鄰族加於本族的名稱巧合的事實。因之，索斯諾夫斯基的假設完全沒有根據。各種族名研究的一般評價決定於這一研究被歷史資料證實達到什麼程度。

因而主要的注意就要放在索斯諾夫斯基妄誕地對待的那些“重要的特徵”上面。

爲了理解鮮卑的一般情況，就要求教於上一世紀前半葉兩個最偉大的漢學家著作中所保存的有關這個民族的一些報道。

約金夫只提出簡單的意見：“鮮卑的語言和風俗與烏丸相似”[⊖]。烏丸被描寫成典型的畜牧者[⊖]。

在克拉普羅特的著作中我們找着以下的有關鮮卑生活習慣的漢文史料：“女子刺繡和打毛毡；男子從事製弓箭、馬鞍和馬勒。他

[⊖] 索斯諾夫斯基，上著，第 189 頁，必須指出，“氏族”名稱 “gir”的接尾部的來源和意義的問題完全未被闡釋，只能以(索氏)的齒辨使人驚訝而已，索斯諾夫斯基輕率地給接尾部加上意義，使人想起古代作者包羅萬象的“各部”。

[⊖] 同上，上著，第 189 頁。

[⊖] 約金夫·比邱林“資料彙編”第 161 頁。

[⊖] 同上第 151—153 頁。

們也善於用鐵和其他材料製造武器^①其次說：他們（鮮卑——札爾金特）不會種莊稼，像稻米一樣，五谷也是仰給於中國的”^②。

按照這一得自漢文史料的片斷的意見看來，鮮卑是個游牧民族，他們的物質生產（五金加工）達到了相當的水平。對谷物的需求（其他的游牧、畜牧者較後才有）表明他們和農業民族有長期的往還。

鮮卑與中國經常的貿易關係的存在也足以證明他們是處於比通古斯人在一切過去歷史時期所能達到的文化水平還要高的水平。

最後，索斯諾夫斯基在論文裏所引用的有關鮮卑的政治實力的資料，證明了在他們中間要不是保存着發達的封建主義，無論如何也存在着極為深刻的封建化過程。

如果從索斯諾夫斯基的觀點出發，那末依他的意見，鄂溫克人似乎就是鮮卑的後代，他們是走從封建主義倒退到氏族制度的路了。在方法學上這類的看法是成問題的。但是如果說作者認為這種看法從他處理資料上來看證明是正確的，那末他就應該把主要注意集中到解釋像謎一般的退化過程，誰也不能在鄂溫克人的社會機構中，也不能在這一民族的傳統和民間文學中找到這種退化的痕跡^③。

同時應該特別着重指出，把通古斯人與鮮卑視為同一民族的看法對最有權威的漢學家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例如克拉普特寫道：在通古斯民族以東和以南的地方自古以來就居住下種族與方言和自己有別的民族：他們的主支組成了漢族名為鮮卑^④的民族。

研究通古斯-滿人的歷史學家通常不是從匈奴和東胡，而是從室韋（失韋）來開始簡述前於通古斯-滿人的民族構成，室韋被宣佈

^① 克拉普羅特“亞細亞史表”1826年巴黎版第14頁。

^② 同上，第94頁。

^③ 有關社會機構和經濟生活退化的假說是教會的“文化歷史學派”（弗·科彼爾斯、弗里茲·弗洛爾）的擁護者所開展的。

^④ 克拉普羅特，上著，第93頁。

爲通古斯-滿人直接的祖先。

克拉普羅特寫道：漢人所知的通古斯人最後一支就是他們稱爲室韋的一支；它是從許多彼此無聯系和不統屬於君長的部所構成。

這是微弱和貧苦的民族，他們以前有個時期曾隸屬於突厥”[⊖]。

室韋分若干部。南室韋住於嫩江兩岸附近，從事畜牧業。無羊、少馬，但是牛猪到處都很多。“乘牛車，蓬藋爲室，如突厥毡車之狀”[⊖]。語言和生活習慣則與游牧的契丹相近似。

依克拉普羅特的假定，北室韋是住在貝加爾湖以東的地方。他們從事狩獵和漁業，穿魚皮做成的衣服[⊖]。九世紀在北室韋九部中有兩個部的名稱可以對室韋的民族成分問題稍有揭發之功。這就是“大如者”和“小如者”。克拉普羅特確定了小如者和珠爾真（女真）是同一名稱的音變，並從這裏得出結論：“那些現在住在東西伯利亞的通古斯部落是起源於這兩部的”[⊖]。

這一結論是根據所有通古斯人源自珠爾真的錯誤的假設的。珠爾真（女真）和滿人直接的起源的聯系現在已經不是爭論的對象了，給一些室韋羣體（部）加上如者的名稱只能證明在室韋部落中有滿人成分的存在。

另一方面，伯希和指出，在室韋部落中間有一個與它相近似的蒙古部落：“在唐代的室韋部落中有蒙兀，這一名詞是和 12 世紀後半葉的、與成吉思汗時代蒙古一名不可分的 Moñru, Moñrus, Moñrul 的名詞相同的[⊖]。

最遙遠的室韋部是“大室韋”，它住在離山國東北幾千里遠的地方，以盛產毛皮著名。他們的語言和其他室韋的語言有別，這就使得克拉普羅特認爲室韋是通古斯人，“大室韋”是蒙古人。

[⊖] 克拉普羅特，第 91 頁。

[⊖] 同上，又見馬端臨，“文獻通考”四裔傳室韋條。

[⊖] 克拉克羅特，上著第 92 頁。

[⊖] 克拉克羅特，上著第 92 頁。

[⊖] 伯希和、吐谷渾與蘇毗考，1921 年通報，第 326 頁。